

我当年曾有幸五次见到毛主席。

小时,刚由私塾转抗日小学,以为陕甘宁就在家乡西山那边,猜想毛主席也会来山这边赶集,按报纸上画像模样对照着,在集上寻找。当读了地理书,才知道陕甘宁原来很远,上集上找毛主席,那是少年的天真。

第一次见做梦也没想到。17岁那年,我被选为参加全国第一次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从沂蒙山,先汽车又火车,一下子到了千里之外刚解放一个多月的北京,那时还叫北平。我没准备,什么也没带,在济南与青年学生见面和受记者采访,介绍自己的诗歌时,全凭记忆。山东代表团是刘导生带队,鲁中南地区的有领导干部李子超、宋诚德、李法荣、张明晓、李兴法等,年轻些的是我、纪丕福、侍振玉……

我们到北京后住在王府井南端路东那栋楼上,开会在校尉营一处礼堂,路上遇到廖承志、黄华等,知道他们也是代表。我打听到《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也来了,我去楼上的一层山西代表团找他,我们一起上楼顶看了北京全景。4月11日开幕那天,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讲话,任弼时作政治报告。中间一个晚上,周总理刚从与国民党谈判前线回来,给大家讲国内外形势,满脸胡子,还没顾得上刮。4月23日,我们乘车去一个地方,受到了毛主席接见。团中央的同志说:“毛主席为大军过江的事,两天两夜没睡了!”大家先是一下子拥上去,后又列成队,毛主席向大家招着手,转了一圈。我不眨眼地看,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好,一直与大家欢呼,心中向家乡的方向悄悄喊道:“我见到咱们的毛主席了!不是在西山,是在北京的香山!”

团中央委员中,除了有熟知的冯文彬、蒋南翔、肖华、胡乔木、杨涤生、杜前,还有作家贺敬之,他是《白毛女》、《南泥湾》的作者,咱们山东老乡。前几年与贺老在电话中叙起往事,他说:“中央对那次大会很重视,专派人民日报一位记者采访,毛主席接见我们时,他左边那个女的就是,姓王,采访过我,据知这人还健在。会上发给每个人的那张照片,你还保存着吧?”

第二次见是1955年9月间当选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时候。山

东代表有郝建秀、徐建春、胡兆坤、谷桂兰等,文艺界是我和王俊英。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9月28日,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山东代表正列在进口的右侧,毛主席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不远处走来,从我们身边走过。这次看得更清楚,看见毛主席比上一次胖了些,面色黑里透红。

大会在结束后的第四天9月30日,即国庆前夕,周总理发请柬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代表,周总理先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大家致意,一起干杯,又一桌桌地和每个省的代表见面干杯。还未走到山东桌,我们就围过去,在别省代表团的外围和总理干杯。当总理走到山东桌,看见早站好的大家说:“山东的,山东大汉多!同山东大汉们干杯!”大家一齐同总理碰杯,又相约拿起杯说:“这一杯是给毛主席的!”总理说:“好,我代表了,我代表毛主席同你们干杯!”总理去了别桌,我们又跟过去,总理从另一排返回,我们又连跟了两桌。我们高兴地想:这次和总理碰了五次杯,和毛主席碰了一杯!

后来,又有三次见毛主席。一是1959年5月1日,全国青联委员去京开会参加观礼,我们在东看台,看天安门观礼台上的毛主席很清楚;二是1960年5月4日他来山东视察,接见省直机关部分处以上干部并一起合影;三是1960年7月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时,《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文艺界代表的照片,毛主席站在那里招着手,正面恰巧是山东的代表,照片上许多人都很清楚,我尤清楚。

当年五见毛主席的情景,至今让我难忘。

1984年的9月,我怀着对伟大亲人的怀念,访问了当年的革命圣地延安;8年后的9月,我恰出发北京,与11岁的小孙子一起去毛主席纪念馆瞻仰了他老人家的遗容。爷孙半个世纪之差,小孙子一到京,就让爷爷领着去看毛爷爷。我和老伴牵着孙子的手,缓步走着,走到水晶棺前,老小一起鞠了一个深深的躬,又仔细看了一会儿。出来,小孙孙和爷爷一样沉思不语地走着,一直到广场合影,孙孙的面容都是庄重的。我仿佛望见了自己少年时代的那个11岁的少年。

我和老伴牵着孙子的手,缓步走着,走到水晶棺前,老小一起鞠了一个深深的躬,又仔细看了一会儿。出来,小孙孙和爷爷一样沉思不语地走着,一直到广场合影,孙孙的面容都是庄重的。我仿佛望见了自己少年时代的形影,在集市上寻找敬爱的人的那个11岁的少年。

我曾经五见毛主席

□苗得雨



1949年4月23日在北京西郊香山广场,毛主席接见参加全国第一次团代会的代表。

【走南闯北山东人】

爷爷闯关东

□朱国荣

我家祖籍山东省掖县,也就是现在的莱州。爷爷是1901年生人,爷爷出生的时候家境还算殷实,兄弟四人,爷爷排行老四。因为上面两个兄长花钱无度,家里老一辈积攒下的家底很快被耗尽,再加上社会动荡,年景不好,等到爷爷自立了门户,眼见着日子难以为继,爷爷便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个春天,独自一人去了东北。

辗转了些地方,总算在吉林省临江市鸭绿江边的一个山脚下落了脚。刚到的时候,爷爷靠开荒种地和给人打短工为生。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好说,可到了冬天,大雪封山,天寒地冻的,东北农村有“猫冬”的习俗,到哪儿去找活儿干呢?爷爷是个勤快人,找不到事干,就挑着篮子四处捡粪。后来爷爷发现离村子越远捡粪的人越少,所以多跑上些路收获还不错。于是爷爷的捡粪之路越走越远。

走着走着爷爷又琢磨出了新的门道儿,冬天人们都不爱出门,可以从县城里捎点瓜子、豆油去偏僻的山村卖。因为老百姓手头也不宽绰,没钱买也可以拿自家的粮食或是山货来换,这样爷爷在整个冬天跑遍了周围的小村庄。

最初是靠肩挑,后来小生意越做越红火,买上了独轮手推车。开春的时候,爷爷靠这一冬天的积蓄在县城边置办了三间小草屋,还给老家捎了钱,这样奶奶终于在爷爷离开家的第二年夏天领着伯父和父亲来到了东北。后来手头宽裕了,爷爷就想买挂牛车拉脚,其实有点现在买辆小货车跑运输的意思。那时买挂牛车要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好歹攒够了钱去城里买车,大约是心里太过兴奋,大意了,挤车的时候揣在怀里的钱被小偷给偷了。五百块呀,这可是省吃俭用的全部家底啊!这飞来横祸让爷爷欲哭无泪、备受打击,回到家后大病一场。

奶奶生怕爷爷挺不过去,劝慰爷爷说,咱跑到东北没给冻死,还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知足吧。没想到爷爷躺在床上却说,早晚我要买上一挂牛车,你看着吧。病好了以后,爷爷比以前更忙碌,起得更早、睡得更晚。这样拼命干了两年,爷爷终于如愿以偿买上了一挂牛车。

解放后,四处搞建设,爷爷就用牛车给砖瓦厂拉货。后来县里成立了水泥厂,因为没有运输工具,国家又拿不出钱来买,就贴出告示说,凡是有牛车的人,带着牛车加入水泥厂,年龄可以放宽,都可以招为工人。所以在爷爷五十岁那年,和许多车老板儿们一起赶着牛车加入了水泥厂,成了工人。

过了几年,爷爷他们到了退休的年龄,没想到刚来的厂长却不承认爷爷他们的工人身份,这样爷爷就没办法办理相关手续,也就意味着没有退休金可领。好多人劝爷爷,胳膊拧不过大腿,认倒霉吧。可经历过艰难困苦爷爷和当初那些一起入厂的人却不是认命的人,于是他们开始了上访之路。对于这些能吃苦却没什么文化的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敢去上访,是因为相信现在是新社会了,老百姓也有说理的地方。最后相关部门终于查清了事实,水泥厂这才兑现了当年的承诺,为爷爷他们办理了退休手续。因为上访爷爷去过三次北京,所以爷爷颇为自豪,一直到老年也保持着一股凡事不服输的劲头。

爷爷退休以后就回了老家。如果说当年去东北是出于无奈,那回山东可就有点衣锦还乡的意味了。退了休的爷爷依旧闲不下来,八十多岁的时候还能骑助力车。

在我的心里,一直对东北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如果说山东是老家的话,那么东北就是故乡。谁能分得清是老家更近还是故乡更亲呢?

【历史钩沉】

揭秘张宗昌讹诈中兴公司的往事

□李海流

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是他一生中得意的时候,多年寄人篱下的他,终于占据了山东和河北、江苏的一部分,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张宗昌的得势,令北方数省的土匪流氓欢欣鼓舞,纷纷前来投靠,致使部队番号一会儿一变,越变越夸张,人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

1925年8月,张宗昌以增加军费为由,强行向中兴公司征收煤炭生产税每吨4角,并带领一万三千多人的军队进驻中兴公司,逼迫中兴公司在10日内交款28万元。当时的中兴公司年产煤炭可以达到82万吨,但是28万元也是一笔巨款。面对荷枪实弹的部队和张宗昌嚣张的气焰,万般无奈之下,中兴公司按照报销军饷的名义上缴了10万银元,这跟张宗昌的要求相差甚远。当时的中兴公司有上千人的矿井护卫队,大炮几十门,机关枪、长枪短枪上千支,这却成了张宗昌向中兴公司讹诈的主要理由。未达到目的的张宗昌以中兴矿井护卫队勾结土匪为由,收缴了矿井护卫队的全部武装。

面对张宗昌的讹诈,中兴公司要么任其宰割乖乖交出剩下

创办于清末的枣庄中兴煤矿公司,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资本独资经营的集煤矿、铁路、轮船公司、盐业公司、炼焦厂等于一体的大型股份制公司。而时任山东军务督办的张宗昌作为流氓和无赖出身,怎么可能放过“中兴公司”这块肥肉呢?成为山东军阀没多久,张宗昌就施展他惯用的伎俩,对中兴公司进行讹诈。



100年前的中兴公司一角。

的军费,要么就得找一个能镇得住他的人来协调此事。这时,中兴公司常务董事任凤苞和刚上任的驻矿经理胡希林向在天津总公司办公的总经理朱启铃汇报。这件事对朱启铃来说并非难事,其原因是:1916年11月,经民国国会议长、户部尚书、中兴公

司监察人赵尔巽的介绍,张作霖拿出六万两白银做股份,入股中兴公司并以其子张学良的名义参股登记,而且朱启铃和张作霖在清末就有交往,二人关系一直甚密。1924年夏,张学良由秦皇岛来北戴河试飞法国进口的水上飞机时,亲自拜访了在北戴河

避暑闲居的朱启铃,并热情邀请朱启铃全家到海边观看飞行。朱启铃的六女儿还嫁给了张作霖的三子张学铭,他们成了亲家。朱启铃把张宗昌讹诈中兴公司的事告诉张学良后,嘱托让他父亲张作霖出面干涉此事。张作霖下令干预后,张宗昌很快交还了中兴公司矿井护卫队的武装,拿着到手的十万元军饷乖乖地撤出了中兴公司。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全国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特别是中兴公司这次遭到张宗昌的讹诈后,为了自身发展,开始大肆拉拢军阀头目作为靠山,以期达到军统庇护企业发展的目的。我们所熟知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黎元洪曾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会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铃、国民政府财政次长钱新之曾任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除此之外,一些军界、商界名流,如张学良、张勋、倪嗣冲、吴炳湘、叶揆初、胡希林、陈景韩等都曾是中兴公司的大股东、董事。中兴公司作为民族资本企业,这么多高级军政要员持股做东,在当时条件下,对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重大的作用。